

消费空间的地方化与商品化生活世界^{〔*〕}

——基于当代城市生存空间变迁的考察

任 政

(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摘 要〕城市生存空间是生存状况的表征,反映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生存空间不断由地域性向全球性拓展,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是,全球化本质上是以资本与市场为内核的消费空间的扩张与原则的普遍化。消费空间的地方化重塑了城市,构成了一种消费型生存空间形式与结构。城市空间成为消费关系再生产的场所,本质上是消费空间的再现。消费空间构筑了一种商品化的生活世界,形成了物化的生存方式。由此,造成了人类生存状态的内在矛盾与悖论,加剧了个体的生活沉沦与生存危机。当今中国必须通过消费空间的辩证认识与批判探求超越商品化生活世界与物化生存方式的现实路径,重构城市生存空间,实现美好生活。

〔关键词〕消费空间;城市生存空间;商品化生活世界;物化的生存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3.012

人类生存的空间维度所展现的生存空间不仅是个体的生活场域,更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状态的空间实现。生存空间内嵌于人的存在,也在塑造、支配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状态。消费主义时代的城市空间成为消费关系再生产的场所,本质上是消费空间的再现。消费空间构筑了一种商品化的生活世界,形成了物化的生存方式,必然导致人类物化的生存状态与方式。从中国现实来看,中国的城市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制度构成

与历史进程。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生存空间建构的尺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换,全球化已经成为基本的尺度。在市场经济原则下,消费空间不断重塑城市生存空间,也正在走向一种消费主导与支配的生存空间形式与结构。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与市场化交织过程中城市生存空间变迁的维度来推进生存空间的重塑,选择与建构当代中国人更好的生存方式与状态,实现美好生活。

作者简介:任政,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升研究”(18VSJ00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价值规范视角下的空间正义范式研究”(2016EX003),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城市哲学与文明比较研究”项目资助成果。

一、城市生存空间的历史变迁：从地方性走向全球性

在传统社会,人类生存于相对狭小、封闭、隔绝的地方之内。在吉登斯看来,前现代“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1]因此,空间和地点是相互重合的。空间也是境遇化、地方化的空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地方是我们使世界变得有意义,以及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2]人类生存根植于地方,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生存空间也只能是地方性空间。由此,地方支配与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民族国家的建立、生产的组织、社会的交往、阶层的形成、身份的认同与生活体验都以地方为基础,形成了以地方为主导的社会生活关系。由此,地方也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所有向度,地方性是其基本特性。地方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具体场所、载体,而且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内在形态及其实现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性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内在规定性及其限度。从总体上来看,地方建构了生存方式。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形成了以“地方性”为显著特征的生存方式。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资本的扩张由地方走向全球,由此开启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进程之中,空间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换。随着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变革和全球化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时空压缩也不断加剧,传统地方与地方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完全被打破,界限正在被重构。因此,传统狭小、封闭、隔离的地方逐渐走向终结。当然,这里所谓的“地方的终结”,并不是指地方的消失,而是指地方融入了全球化过程及其元素,成为全球化中的地方及其构成部分。“‘地方发生的事受到远距离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这样遥远的地方就联系到一起’”。^[4]地方之间的相互制约、彼此建构不断增强。应该说,全球化过程就是一个重塑地方、不断创造新的地方的过程。在全球

化之下,地方空间化了,发生了全球化转型。全球化也极大地推进了地方性生存空间的变革。人类的生存空间也必然由地方走向与全球的对接与融合。从一定意义上说,生存空间建基于全球化基础之上,其实质就是一种全球性生存空间。具体来说,全球化与地方化作用的焦点在城市,这种生存空间的变迁也集中呈现在城市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全球化对城市的支配与操控。

“全球化进程引发了城市的变革”,“城市已经成为了全球化过程的空间表达”。^[5]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及其作用之中,地方逐渐丧失了对城市的支配性与决定性的力量。相反,全球化的力量不断增强,具有了主导性的地位。由此,全球化一定意义上支配了城市。而且,随着全球化对城市塑造的不断增强,城市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被重构。城市的功能与意义也被置于全球化之中,赋予了其新的内容,也具有了全球性。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得当今世界中的任何城市都是全球化中的城市。当然,全球化也是地方交织作用中的全球化。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塑造、相互作用,实现了城市中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因此,城市建构与推进的尺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换。

城市是生存空间的基本形态,是人类生存方式与状态的空间表达。全球化在加速城市的扩展与重构基础上也塑造了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与状态。“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6]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7]在全球化与地方的交织之下,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状态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地方性的生存走向全球,形成了全球性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使当代人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域的局限性与限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8]这当然有助于消除个人的地域片面性和狭隘性。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是谁?我

们属于什么空间/地方?我是世界的公民,还是国家或地域的成员?”^[9] 这些问题都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所遭遇的重大问题。

其二,当今时代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操控集中展现为消费空间对城市空间的操控。

全球化是资本与市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化与市场化是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内在动力与支配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与市场的空间扩张。一方面,资本积累模式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的、更加多变的积累模式转变。当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与消费关系也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由工厂向城市整个日常生活领域扩展,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更加普遍化。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心城市土地与房地产的资本化、金融化,城市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走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与消费。“国家在城市规划中的撤出与市场作用的日益增强,导致了一个在世界各地被复制的日益增长的城市商业化的过程”。^[10] 因此,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化与市场化在城市中交叉整合、相互促进,城市的商业化趋势加剧,标准化的消费空间形成。消费空间成为城市地方建构的一个主要角色。^[11] 消费空间地方化,通过城市得到实现与再现,变成了地方性的消费空间。城市空间由生活场所转换为消费空间。所以,在迈尔斯看来,“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属于人并服务于人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消费效益最大化的装置”。^[12] 城市空间本质上是生存空间,但是,却成为消费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城市生存空间的消费转向与主导,急剧加速了生活世界的同质化。而且,全球化过程中这种扩张趋势具有了必然性、合法性与正当性。

其三,生存空间推进的尺度与塑造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换。

传统上,我们主要是以地方化为尺度来分析与推进生存空间。随着全球化与地方化在不同层面的深层互动、相互关联,全球空间不断形塑与支配地方,生存空间的建构必须考虑全球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内在张力。一方面,生存空间的问

题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而且也是全球性的问题。生存问题的推进既要关注和面对地方中的生存问题,也要思考和回答全球化中的生存问题。当然,地方中的生存问题并没有终结,而是与全球生存问题交织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与流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存问题也随着全球化不断扩张,走向全球,成为导致一切地方生存问题的重要根源。所以,生存空间问题及其根源发生了重大的转换,生存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另一方面,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与地方的实现与推进也相互交织在一起。一个地方生存空间的重塑也有赖于全球化及其他地方生存空间的改造。所以说,生存空间的变革建立在全球的推进基础之上。全球化既为生存空间的推进与塑造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其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因此,生存空间的建构与推进不仅要具有地方视域,更需具有全球的视域。当然,地方性生存空间的改造也会推进全球性生存空间的变革,必然为全球性生存空间的改造创造条件。生存空间的推进与实现既要充分考量全球化与地方化力量的交织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利用这种交织力量来推进变革的实现。

二、消费空间的地方化与商品化生活世界的构筑

全球化是资本与市场原则的普遍化,也是消费空间的地方化与普遍生长。所以,消费空间“不是在被动地消费城市,而是在主动地介入城市”。^[13] 消费空间重塑了城市,具体化到了城市之中,成为一种消费型的生存空间形式与结构,同时也建构了当代人的生活图景、生存样态与生存体验。消费空间所构筑的生存空间,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化的生活世界,形成了物化的生存方式与状态。由此,造成了人类生存状态内在的矛盾与悖论,即物质生活的丰富性与生存方式的单一化的二重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消费空间的生长催生了商品化生活世界,社会财富迅速

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具有了较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当然,这种丰富性集中表现为商品世界的丰富性与消费的多样性。世界各地的商品都可以选择,各种娱乐活动也都可以参与、体验、享受。商品的极大丰盛一定意义上消除了物质的短缺与绝对匮乏,形成了所谓的“丰盛社会”。物质生活可以有多样的选择,生活似乎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消费空间对生存空间的塑造推进了日常生活的“差异空间”向消费化的“同质空间”的现实转换。因此,这是一种去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的扩张过程。物质生活的富裕、满足并不等于生存的多样、丰富,更不等同于人人都可以享用。相反,消费空间的普遍生长、地方蔓延,促使生存空间均质化,消除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传统性。所以,商品化的生存空间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支配下的单向度的生存,一种物化的生存。这种多样的生活选择,实质上却是不自由的,没有选择的。这不仅是一种个体的生活方式,而且更是集体的普遍生活方式。消费空间的扩张已经从根本上控制了人的生存空间,构筑了一种总体性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普遍的物化是这种生存方式的一种表征,创造性破坏是这种生存方式的总体趋势。

(一)城市更新与消费空间的地方再造

消费空间的普遍生长,推动城市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与消费。为了迎合和适应这一趋势,城市更新以市场为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的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的重建、重塑。一方面是消费空间对地方传统的侵蚀与再造。全球化与城市化交织中的城市更新日趋均质化,消解了地方传统,“地方性”逐渐衰退,由此造就了“全球本地化”“无地方性的地方”。地方的历史与传统遭遇挑战,正在经历重大变迁。所谓文物古迹与历史遗址的修复实质上是商业化的改造。古城、古镇、历史文化名街均成为商品化的对象。在迈尔斯看来,“地域的本土和当地意义已经被转变为一种标准化的产品”。^[14]虽

然消费空间的地方再造不断整合了西方元素与东方元素、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表面上延续了传统的形式,内在却是商业化了地方传统。“嘲讽在于:传统现在经常受到被当作商品和在市场上销售的保护”。^[15]另一方面是城市空间的商业化、不动产的动产化。城市空间得到重新包装、设计、调整,推进消费空间的生产与再现。城市更新过程中不断营造消费景观,地方化、现实化了消费空间。街道、广场、公园、主题乐园、全球连锁店、专卖店、体验店等均是消费空间的地方生产与再现。因此,“城市正在沦为物质商品成批生产和大众消费的理性化与自动化体系的牺牲品”。^[16]城市更新追求的是最大化的商业效益,最优化的市场效果。由此,住房的普遍市场化、商品化催生了房地产的疯狂。传统建筑的改造,大型集居区被拆除和改变,代之以独栋住宅、高档别墅。城市的多样性、传统性、文化性遭到破坏。世界各地的城市日渐趋于均质化,逐渐失去个性与传统。每一座城市的特色消失,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而且,城市更新呈现出绅士化的趋势。“中产阶级是创造美好‘家园’的过程,穷人经验到的却是流离失所”。^[17]因此,城市更新、强制拆迁造成了阶级分化与贵族化,形成了同一个城市生活、不同的生存境遇的状况。

(二)城市文化与意义的重构与再生产

消费空间也是一个消费文化与意义的空间。所以,消费空间的生产与扩张过程也是消费文化与意义的扩张。在哈维看来,“市场力量向整个文化生产领域的合乎逻辑的扩展”,^[18]消费空间介入与操控了文化与意义的生产。一方面,消费空间不断破坏与消解地方文化传统,重塑了地方文化。无论是街头文化、艺术,还是寺庙与宗教文化均在营造商业文化氛围。“文化生产‘已经在总体上被并入了商品的生产’”。^[19]另一方面,消费空间能够生产文化、再现意义、传递符号。具体而言,一是调动大众市场的时尚,加快消费速度。在哈维看来,“调动时尚、流行艺术、电视、

其他媒介形象的形式以及各种都市生活方式,它们都已经成了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20]因此,文化生产和市场营销浸染了社会与文化生活的整个领域。购物节、狂欢节、光棍节等节日文化吸引全民主动参与狂欢。品牌文化、时尚文化等也在引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推进了消费文化与意义的生产。二是商品消费向服务、体验消费转变。消费不仅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且是都市生活的体验、享受。应该说,旅游文化、休闲文化,视觉文化等都是消费体验、服务与娱乐化趋势的体现。体验消费、娱乐消费不仅成为消费习惯与生活态度,而且还转变为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特别是,广告“日益适合于通过各种形象来操纵各种欲望和趣味”。^[21]短暂的娱乐和体验刺激欲望的生产。消费幻象主宰了需求与满足,不断生出虚假的需求与满足,塑造消费意向。尤其是人们对新商品潮流的迷恋、炫耀,沉醉其中,自我放纵,无法自拔。

(三)城市生活的消费化组织与规制

消费空间直接控制与组织了城市生活,对日常生活不断进行挤压与强制。进而,消费空间营造了一种生活秩序、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消费不仅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与形态,事实上转换为当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状态。伴随着日常生活的消费转向,物的包围、刺激物的轰炸,加强了诱导性消费,形成了无形的强制性消费。“购物已走向殖民化,甚至几乎代替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22]因此,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与商品消费。城市生活的消费化组织,购物成了生活方式,导致了个人的生活全面商品化,不断增长物的依赖性,受到物的困扰。“我们的作用只在于消费”,^[23]由此产生了对物的全面依赖和社会生活的普遍物化。特别是“住宅的交换价值,让社会生活的堕落合法化了”。^[24]物化的标准与尺度成为生活的普遍尺度与标准,甚至是衡量人的一切价值的尺度,遮蔽了生活的多重维度与尺度。人的多样、丰富的生活走向了均质化,又不断产生

了社会差异。生活的均质化是商品的普遍化标准与依赖,并不会趋于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相反对不同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与效果。在马克思看来,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25]所以,生活的均质化一方面带来生活的富裕,另一方面又在制造生活的贫穷。消费空间的整合逻辑是吸纳与排斥的逻辑,即迎合富人,驱逐穷人。一部分富人的生活无比精彩,另一部分穷人则生活无奈、绝望,忍受各种折磨、痛苦,由此加剧了社会生活中的破碎感和分裂感,也造成了生存的矛盾与冲突。

(四)个体的生活沉沦与生存危机

消费空间不仅增加了个人的生活成本与代价,更为根本的是造成了个体的生活沉沦与生存危机。消费空间的地方化运作是一种不断的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的“创造性破坏”过程,通过无休止的空间更新从而释放空间,重新投入生产与消费。在约翰·厄里看来,“在都市里,存在着一个正在涌现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到处充满着流动和不稳定性”。^[26]生活的短暂、无限分裂、不可持续、不确定性、不稳定、不断变革的状态迅速扩张,从而加强了生活的不可控性与生活沉沦。人类也进入了一个消费无限扩张的社会,人的生存充满了紧张、焦虑和不安。生活的习惯与传统也被破坏,地方感丧失,集体身份与记忆遭到重构,生活的安全与归宿感被消解,人的生活变得“无家可归”“无处安顿”,成为了“无根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当代人物质生活获得极大的满足,也会被未来面临的风险,以及获得的不可持续所产生的生存焦虑、忧愁所困扰,由此产生了个体的虚无主义。

而且,商品化的生活世界是一种“单调的世界”,其他生活被挤压,遮蔽了人的精神与价值维度,造就了“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人的精神贫困与荒芜。哈维明确指出,“这种丰富性的对应面是无家可归、无能为力和穷苦潦倒的灾祸,它们席卷了许多中心城市”。^[27]因此,消费空间不仅是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殖民,而且更是对精神生

活的殖民,破坏人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所以,迈尔斯认为,“商业化现象业已泛滥,甚至走向了庸俗化”。^[28]物质生活的堕落与梦想的毁灭,没有了诗和远方,只有眼前的苟且和享乐。从深层次来看,消费空间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压迫体系、抽象的统治,而且取得了合理性。我们越来越习惯、满足于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与状态,呈现“集体无意识”。我们似乎只有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与状态,而且也应该是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与状态,没有了别的选择。

三、当代中国城市生存空间的重塑:多样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的建构

面对城市生存空间的商品化、同质化,人类生存的物化与焦虑,如何选择与重构生存空间,摆脱商品化生活世界与物化境遇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西方空间批判理论中无论是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由资本的“抽象空间”向日常生活的“差异空间”的转换、福柯的“异托邦”、哈维的“反叛的城市”与“希望的空间”,还是索亚的“第三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探求超越资本支配下物化的生存空间的可能与路径。我们必须从中国城市生存空间塑造的现实需求出发,进一步推进丰富、多样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的建构。

第一,消费空间的辩证批判与生存空间的可选择性。

全球化时代生存空间从地域性走向全球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内在趋势。而且,“消费空间给消费者提供了满足需求和欲望的机会”。^[29]所以,消费空间所塑造的普遍化和商品化的生活世界也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现实来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化过程之中,开始了更为激进的城市更新与消费空间的普遍生长,造就了难以遏制的商品化生活世界的扩展过程。所以,我们也处于商品化生活世界与物化的生存方式之中。而且,我们完全浸淫在商品化的生活世界的幻象之

中,消解了“否定性、对立性、反抗性、批判性”与“内省性”的空间,丧失了维持批判间距的能力。^[30]那么,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与发展能否塑造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多样、丰富的生存空间与生活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生存问题。

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面临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就是要探索与揭示人类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从“所有可能的世界”走向“所有可能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人,他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的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31]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满足”的一种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而社会主义社会本性上也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换的生存空间,其发展趋势是把人从消费空间所构筑的商品化生活世界的物化与支配中解放出来,实现生存方式与生活状态的丰富性、多样性。所以,社会主义的生存空间不仅要实现物质生活的富裕与满足,更要塑造多样、丰富的生存方式。为此,我们必须明确商品化的生活世界并不是唯一的、合理的生存空间。物化的生存也只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可选择的生存方式。而且,商品化的生活世界具有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存方式,内在设定了其自身的边界、界限与限度。所以,我们必须展开消费空间的批判与反思,自觉担当起反抗消费空间抽象统治的使命与意识,充分认识到商品化生活世界的有限性,揭示人类生存状态与方式多样性、丰富性的多种可能。最终,从消费空间批判走向生存空间的选择与空间行动,改造我们的生存空间。

第二,当代中国生存空间与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及生存方式的塑造。

正如列斐伏尔所言,“不创造一个合适的空间,就不能创造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32]我们要改变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首先需要改变生存空间,通过空间的改造重塑生活的意义与生存方式。为此,需要从生存空间的角度进一步挖掘出

人的生存与空间重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体探讨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与重组过程中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的变迁与重塑。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日常生活中社会普通大众的生存状况,追寻对普通大众生存方式的把握和生存境遇的揭示。现实取向是推动生存空间从消费的抽象化、同质化空间向日常生活的差异化空间的转换,探求一种替代性的城市生存空间的可能与路径,维护和实现社会个体的生存自由与选择。从深层来讲,这些探讨不仅是“宜居空间”的建造问题,而且是一种新的人类生活世界、生存方式的开拓与创造。

其一,营建中国特色的差异性生存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33]社会主义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着力于从中国现实生存空间重塑的高度探索消费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的融合发展,营建既具统一性又具多样性的差异性生存空间。一方面,合理利用消费空间的扩张,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城市更新与空间的合理安排,抵制消费空间在中国社会的蔓延,推进日常生活的空间回归与再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房子是用来住的”。我们要坚持功能性、工具性的空间向日常生活空间的转换,从支配到取用,使用优先于交换,摆脱物化生活的奴化。我们不仅要物质生活的富裕,更要有多样、丰富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当然,这里的差异性生存空间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人与人在生活上无限分裂、冲突与对抗的生存方式与状态。我们所主张的差异是多样生活方式的合理共存与和谐共处,力求实现生活的丰富性、全面性、饱满性,提供安逸和谐的生活。

其二,城市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回归与重建。历史与文化传统是城市的文脉、文化基因,不仅是城市的特色与生命所在,而且也是个人生活的根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完全回归城市历史与文化传统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但是,中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秉持地方多样性。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既“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所以,我们要实现城市更新中“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的辩证统一,推进城市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复兴,打造地方性文化特色。中国城市发展及其城市化的重要内涵就是重建地方性,注重城市的传统文化的修复与生活意义的建构。以此,营造“地方感”,留住乡愁,满足梦想与精神寄托,增强城市记忆与认同的功能,进而推进中国人的生存空间的地方重建,从消费空间、物化的生存中解放出来。

其三,引导与确立多种尺度与需要的美好生活。人的生活是多重尺度的,既有物质的尺度,也有价值与意义的尺度。美好生活既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又不能被完全物化,必须摆脱物质生活的奴化。因而,生存空间不仅要有居住功能,而且还要有日常生活与意义的功能。美好生活不仅是物质消费,而且还有精神与价值的追求。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全面不仅是全体人民的小康,而且也是全面的生活标准与尺度。我们必须坚持“多样性”“人性化”与“全面化”的标准与尺度,追求高尚体面的美好生活方式。为此,必须引导与确立多样、合理的生活尺度与标准。美好生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内在要求多样性、丰富性的生存空间内涵与属性。我们要进一步丰富和扩展生存空间的内涵,提升价值,将其定位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个性的满足之上,既要实现物质生活上的满足,更要实现精神与价值生活中的尊重与成就,增强生活的安全感、稳定感和归宿感,进而塑造美好的生活、全面发展的人。

第三,走向全球性生存空间的重塑。

全球化时代城市生存空间的重塑不再局限于地方与民族国家的框架,必须走向全球空间的重构。所以,生存空间的重塑不仅是地方的运作,也是全球性生存空间的重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们不仅注重地方性生存空间的营造,而且也注重对全球性生存空间的重构。但是,从总体

上来看,中国主要是以适应全球化趋势为主。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全球化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与加深,更加推进了消费空间的全球扩展与蔓延。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多样、丰富的生存空间的营造不仅处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结构之中,而且越来越受制于全球性消费空间及其商品化生活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社会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换,不断影响与塑造全球化,走向了对全球性消费空间及其所构筑的消费型生存空间的重塑。尤其是,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全球化与区域格局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并对全球性生存空间的塑造也在不断增强。从长远来看,中国发展方式的转换与实力的提升必然进一步走向对全球化的塑造,提高改造全球性生存空间的能力。而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有责任也有义务走向全球性生存空间的塑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向全球性生存空间的重塑,内在超越了资本全球化所塑造的消费空间及其商品化生活世界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展示了全球化发展模式与生存理念的变革,为重塑新型的全球性生存空间提供了现实的路径,引领与建构着人类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2][17][美]蒂姆·克雷斯威尔:《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徐苔玲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23、150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4][美]爱德华·苏贾:《后大都市》,李钧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5][10][11][12][13][14][22][23][28][29][英]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孙民乐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0、58、108、2、68、159、105、113、86、176页。

[6][7][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9][33]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4、55页。

[15][18][19][20][21][27][美]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80、86、88、88、359、415页。

[16][美]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导论第7页。

[24][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3-744页。

[26][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30][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1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6页。

[32][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